



20_{世纪}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湖北教育出版社

瞿林东/编

中国史学史研究

K092
Q825

20^{世纪}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中国史学史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研究/瞿林东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ISBN 7-5351-4541-8

I.中… II.瞿… III.史学史-研究-中国 IV.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911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8.5 印张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435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4541-8/I·154

定价:30.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说 明

一、为了弘扬学术、传承文化,我们推出了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以下简称为《文存》)。

二、《文存》是一套集多学科、多层次、多卷本而成的20世纪学术研究成果精华库,其每一卷都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导论、文选、目录索引,三者互为呼应。

三、《文存》中的“导论”和“目录索引”部分,均按现行的出版标准和规范进行排印。

四、对《文存》中的“文选”部分,需作如下说明:

1. 选文的时间范围: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2000年;
2. 选文的地域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对国外的原创之作不作统一要求;
3. 对所有入选的作品,一律采取简体横排;
4. 将原载中带有注码的注释统一改为篇末注,对括号内的夹注也进行了版式统一;

5. 对原载中的直接引文进行了版式统一；

6. 对原载中的标点符号(尤其是书名号、引号等)进行了版式统一；

7. 由于入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语言规范不一致,故对其原载文字不进行整体上的统一,也不一一校勘;这样既可以反映学术史的真实,同时也尊重了原文,保持了原貌,从而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8. 出于篇幅的考虑,少数长篇小说或论著进入《文存》时采取了节选的方式,并予以注明;节选部分的章节序号也完全依照原载;

9. 由于一些不可克服的原因,对少数经典论文采取了存目的方式。

五、特此说明,敬请广大读者鉴识。

总 序

陈平原

给 20 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来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作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 20 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备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吸引学界的眼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令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对所收各文,除进行必要的版式统一(如简体横排、篇末注等)之

外,其他则尽量尊重原文保持原貌,这样既反映了学术史的真实,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2001 年 11 月 17 日于北京西三旗

| | |
|---------------------------------------|-----|
| 总序/陈平原 | 1 |
| 导言/瞿林东 | 1 |
| <hr/> | |
| 一 总论 | 63 |
| 中国之旧史/梁启超 | 65 |
| 中国史学之发展/何炳松 | 71 |
| 史的史/卫聚贤 | 75 |
| 《中国史学通论》序/朱希祖 | 81 |
| 什么是史学史/耿淡如 | 83 |
|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白寿彝 | 93 |
|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吕振羽 | 102 |
| 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概述（节录） /杨翼骥 乔治忠 姜胜利 | 111 |
| <hr/> | |
| 二 通论 | 131 |
| 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 | 133 |
| 《中国史学史》绪言/蒙文通 | 151 |
| 《中国史学史》自序/魏应麒 | 153 |
| 《中国史学史概论》自序/王玉璋 | 155 |
| 《中国史学史》导言、结论/金毓黻 | 166 |
| 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 | 172 |

| | |
|-------------------------------|-----|
| 《中国史学史》自序/李宗侗 | 206 |
| 《中国史学史稿》叙论/刘 节 | 208 |
| 《中国史学史论丛》前言/陈光崇 | 217 |
| 我和中国史学史/白寿彝 | 222 |
| 《中国史学简史》绪言/施 丁 | 241 |
| 《中国史学史纲要》绪言/王树民 | 250 |
| 《中国史学史纲》自序/瞿林东 | 257 |
| 三 分论 | 263 |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节录）/周予同 | 265 |
| 《当代中国史学》引论/顾颉刚 | 279 |
|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节录）/齐思和 | 283 |
| 《新史学九十年》自序/许冠三 | 305 |
| 《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前言/陶懋炳 | 309 |
| 《中国近代史学史》前言/吴泽 袁英光 桂遵义 | 316 |
|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序/肖 黎 | 330 |
|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陈其泰 | 337 |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林甘泉 | 352 |
| 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节录）/王晴佳 | 384 |
| 四 专论 | 399 |
|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守常 | 401 |
| 试论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仓修良 | 405 |
|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吴怀祺 | 428 |
| 《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序/杜维运 | 437 |
| 《中古史学观念史》序论/雷家骥 | 439 |
|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瞿林东 | 453 |

| | |
|----------------------------|-----|
| 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白寿彝 | 480 |
| 史学评论的萌芽/逄耀东 | 484 |
|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主要论著目录索引 | 498 |
| 编后赘语/瞿林东 | 574 |

导 言

瞿林东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有久远的历史和繁富的文献,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当然,作为近代学科之一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是作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中国史学史被明确地提出来从而对其进行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乃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不过70多年的历史,这同中国史学本身的历史比较起来,确有天壤之别。

但是,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的史学史意识萌生甚早。不论这种意识的自觉程度如何,也不论其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它的积累和演变,已足以写成一部历史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来回顾和讲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有关问题,就很自然地要从史学史的意识、观念的产生与演变说起。

引论:中国史学史之观念的历史

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或观念,早已产生,并有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至晚在东汉的时候,史学家班彪已经具有史学之历史的意识。班彪不满意于一些“踵继”司马迁《史记》的文字,欲继承、发展司马迁的事

业，“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他写道：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梲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梲杌》之事遂谥，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①

下文还有若干评论，从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应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概括的叙述。班彪在有的问题（如关于《左传》、《国语》的作者）的认识上，后人可以不必赞同，但他的这段文字，从《诗》、《书》到“国史”，从《春秋》到《左传》、《国语》，从《世本》到《战国策》，从《楚汉春秋》到《太史公书》（《史记》），把官府修史和私家撰史都讲到了，突出地反映出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应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把班彪称为具有“中国史学史”观念的前驱，他自当之无愧。

此后，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一书，其《史传》篇以评论为主，但也反映出作者的“史学史”意识。其文从史官起源而论及《雅》、《颂》、《春秋》，从《楚汉春秋》而论及马、班，从“后汉纪传”而论及“晋代之书”，虽未详尽，然脉络可见。其评论之词，同样亦寓有史学发展之史的含义。

东晋南朝以降,文献分类趋于定型,至唐初《隋书·经籍志》的问世,则历史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格局已成。同时,随着史学理论著作《史通》的面世,人们加强了对史学的研究。自此以后,“史学史”意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继续发展,一是循着史部目录的路径向前发展,一是循着史学理论的路径向前发展。前一条路径,如《隋书·经籍志·史部》、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史部》、高似孙《史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而达到一个高峰。后一条路径,如刘知幾《史通》关于史书编纂体裁、体例演变的历史,关于历代正史的发展,关于史官制度的沿革等方面的论述;《唐会要》关于“修前代史”和“修国史”的有关记载;《册府元龟·国史部》关于历代史书撰述的各种情况的分类记载;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之评论历代正史;明代学人关于历代史论的各种汇编;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与刘知幾论史学而名其书为“通”之意甚相近,都有通论意识,而其书之论“六经皆史”的观点,论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论“通史家风”的传统,更是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史学史意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对历代正史的考证和评论,且又多注意从史学论及历史,可以认为是“史学史”意识的更深层的发展等等,也逐渐达到一个高峰。

举例来说,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二》,把史书分为13类,考察了每一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撰述的渊源流变,著录了存佚情况。其各类小序,则述其发展梗概。可以认为,这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刘知幾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他撰写的《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就是明证。他认为:“史之称通,其来自久”^②,可见他很看重这种意识。当然,他这里讲的“史”,既有客观历史的含义,也有史学的含义,而其《史通》自属于后者。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史通·古今正史》篇叙述了历代正史撰述的情况,且间有评论。它依次论述了《尚书》、《春秋》及《三传》、诸侯国史、《史记》、《汉书》、《汉纪》、《汉记》(《东观汉记》)、《后汉纪》、《后汉书》、曹魏史、孙吴史、《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晋史、南朝宋史、齐史、梁史、陈史、北方十六国史、北朝元魏史、高齐史、宇文周史,直至隋史、唐初所撰本朝史。刘知幾所谓“正史”,包含了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在内。故其篇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史通·史官建置》篇起首写道:“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其篇末也说:“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篇中所论沿革、废置情况上起于三代,下迄于本朝。倘若再联系《史通·杂录》篇之论“偏记小说,自成一派,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的种种流别,则《史通》实已写出了在当时堪称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了。其史学史意识之自觉性和表述这一意识的水准与形式,都极为突出。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型类书,其卷五五四至五六二是为“国史部”,凡九卷十四目,包括总序、选任、公正、恩奖、采撰、论议、记注、谱谍、地理、世官、自序、疏谬、不实、非才,而《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又如南宋洪迈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书、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③如前所述,宋代还有一些目录学家、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高似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章学诚以揭示“文”、“史”的“通义”为其撰述宗旨,而以论史的

“通义”为主,这是他与刘知幾的相似之处;所不同者,章学诚自谓以论“史意”为主,而刘知幾是以论“史法”为主。诚然,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④。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应“义例所通”^⑤。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¹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⑥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⑦这是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观念的反映。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⑧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深刻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认为:古史讨论“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态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⑨这里,胡适虽然没有具体地谈论“中国史学史”,但这是目前我们所知“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之最早的提出。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作《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在中国

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之一个分支的观念,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⑩。

总起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行进到 19 世纪中叶,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初年,由于社会的变动和学术思潮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走上近代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史学史则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专史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的学术背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史观的传播,一方面是学术史的发展。

(一)新史观传播的背景。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其历史观的主导因素,是西方进化论。19 世纪末,严复、康有为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近代进化论,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潮。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是这个思潮在史学中的延伸和突出表现。他在此文中十分强调“史学之界说”,实则是以进化论重新解释史学。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家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⑪显然,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等等,都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上很早就产生的朴素进化思想推进到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的新阶段了。在 20 世纪的最初 30 年中,这种进化论思潮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新的中国历史著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纷纷问世,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